**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作者简介：**司林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裴索亚，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萌芽、初步探索、快速兴起、繁荣发展和深化提质五个重要阶段。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在政策理念、主体、内容、工具和目标等方面呈现出从“服务革命”向“改革创新”、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从“单一松散”向“系统规范”、从“强制工具”向“混合工具”、从“普及教育”向“全面发展”转变的变迁特征。这种变迁并非偶然，而是评价主体、外部环境和制度属性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应该更加重视理念共识和多元协同参与，在评价内容、评价工具以及评价结果的有效运用方面不断探索与创新，为深化新一轮教育改革发挥科学的指挥棒作用。

**文章出处：**司林波，裴索亚.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历程、特征与展望[J].现代教育管理，2021（10）：1-11.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历程是党和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对教育评价政策的调整和转换过程。由于我国教育评价制度长期由党和政府主导，党和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反映了教育评价制度调整的重要方向，因此，可以认为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规律表征在政策历史的过程之中。政策文本“记录”了教育改革的历史轨迹，基于对教育评价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更好地呈现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层面的教育评价相关政策文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变迁历程及其演化特征，总结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经验与不足，进而为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基本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在探索中不断改革和完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教育评价政策的发展历程能够反映教育评价制度在特定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关注点，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变迁的百年历程，并由此探究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特征和规律，是探索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如何全面落实和寻求重点突破的重要路径。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评价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历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梳理，不同的研究者因其不同的研究视角而存在不同的阶段划分标准。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工作重心的不同，以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和代表性的教育评价政策文件的出台情况，对建党以来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百年历程进行阶段划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党领导教育工作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教育评价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教育的兴起催生了教育评价制度的早期萌芽，为新中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教育评价制度的初步探索，尽管在一些政策文件中，开始出现对学制进行改革、对中等技术教育进行管理和评价、制定中小学教师考核标准等诸多内容，但这一时期在教育评价方面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我国的教育评价制度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1977年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统一招生制度的恢复极大地刺激了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因此多将1977年作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阶段划分的起点。本研究认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真正启动和发展，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政策为教育评价制度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以1978年改革开放作为阶段划分的时间节点更为妥当。此时，教育评价制度在我国真正起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号召下，各类教育评价理论和实践活动日益兴起。

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教育评价的具有行政法规性质的专门文件，是教育评价的一般规律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教育评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走向了规范化，并逐步进入教育评价制度的繁荣发展阶段。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为全面提高教育评价质量，总结我国在前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深入分析教育评价工作存在的差距和不足，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多次提到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实施完善“综合素质评价”，至此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工作重心的不同，以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具有代表性的教育评价政策文件，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划分为早期萌芽（1921—1948年）、初步探索（1949—1977年）、快速兴起（1978—1989年）、繁荣发展（1990—2009年）和深化提质（2010年至今）五个阶段。教育评价制度的演进有其自身的独特逻辑和历史轨迹，对教育评价制度的阶段划分是准确认识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历程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基本阶段**

**1.早期萌芽阶段（1921—1948年）**

1921—1948年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早期萌芽阶段，这一时期出台了以《颁布学制与实施目前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教育行政纲要》（原名教育工作纲要）等为代表的教育评价相关政策，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并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概括，开创了教育评价制度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我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党领导下的教育实践虽然所处环境非常恶劣，但仍然积极进行教育评价活动，如1934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小学管理法大纲》中涉及对学生成绩的评定、考试方法以及对学校的监督和检查等多方面内容。同年，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正的《教育行政纲要》中也提到要用定期巡视和抽查的方法对学校、教育机关及其他教育组织进行检查 。抗日战争时期，基于革命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进行教育评价的新定位。194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延安机关学校政治教育的通知》中重点提到，教育要以配合审查干部、坚定革命立场为主要任务 。这一时期学生成绩评定、考试方法、赏罚衡量、监督检查等都可以看作是教育评价活动的萌芽。

基于对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政策文本内容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见图1），我们可以发现，教育评价制度在政策理念、主体、内容、工具和目标等方面的一些特点。政策理念上，从“革命”一词可以充分看出教育评价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的价值取向。政策主体上，教育部和委员会两个关键词在网络中处于很重要的连接位置，属于重要的政策参与主体，其他主体在网络中对它们的依赖性较高。政策内容上，教育、群众、小学、儿童等关键词能够反映出教育评价政策中较为关键的工作任务，即强调加紧群众的政治教育，尤其注重青年儿童的文化教育，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政策工具上，计划、命令执行等关键词出现在网络边缘位置，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命令性工具并未得到完全使用。政策目标上，扫除文盲、实行教育普及、摆脱蒙昧状态、使工农群众能够从事革命斗争和享受文明幸福生活成为这一阶段教育评价政策的现实任务和目标。

 总的来说，在萌芽阶段，尽管政策文件中开始出现有关教育评价的内容，但此时的教育评价政策内容非常少且偏宏观，已有的内容也属于原则性表述，实际操作性不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评价制度在这一时期并未得到有效重视，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各个方面的教育还未形成一条成熟的发展路线。

**2.初步探索阶段（1949—1977年）**

1949—1977年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初步探索阶段，这一时期出台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等为代表的教育评价政策，是当时条件和认识水平下对社会主义教育评价制度的努力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配套的集权管理模式，同时受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以及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教育评价制度进展缓慢，出台的政策文件相对较少，有关教育评价制度的概念和体系虽尚未形成，但已经开始了对教育评价制度的初步探索，如政务院出台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等早期教育评价政策文件。1958—1960年，我国经历了“教育大革命”，教育教学秩序被打乱，为稳定和恢复教育事业，纠正“教育革命”偏差，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确立了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地位，重点指出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如对教师考核要以他们担任的教学任务、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为依据，这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966—1976年，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经历了短暂停滞，直到1977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 《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研究和实践才开始重新起步。

基于对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政策文本内容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见图2），我们可以看出，“政治”这一节点紧邻“教育”，且连线较多，意味着这一时期注重将政治觉悟作为评判教育的核心理念，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政策主体上，“中央”是政策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教育评价制度的主要发布者，在政策网络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政策内容上，重点在于明确各级各类学校领导关系，并根据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对我国原有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和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整顿和改进。政策工具上，主要以批准、规定等命令性政策工具为主，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统筹管理和控制。政策目标上，“培养”“建设”“教育”等关键词之间连线较多，说明逐步恢复教育秩序和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进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快速培养建设人才，是该阶段教育评价制度的主要目标。

总的来说，在初步探索阶段，党的教育评价工作重点不再局限于宏观层面的教育评价，而是扩展到了学校和教学评价等方面，政策得以细化，教育评价制度建设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虽然政策体系尚未建立，制度的雏形并未完全显现，但其内涵已渗透在相关政策中，为后期教育评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基础和政策空间。

**3.快速兴起阶段（1978—1989年）**

1978—1989年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快速兴起阶段，这一时期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转发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等文件的通知》等为代表的教育评价相关政策，标志着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研究和实践进入了全面开展阶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为进一步推进教育评价制度的发展，党中央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以1986年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颁布的《关于转发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等文件的通知》为标志，我国教师评价制度基本成型。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各类教育评价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日益兴起。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高等学校办学水平评估问题”。同年11月国家教委出台《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建立高等工程教育评估制度的要求，并全面部署了对高等工程教育的评价研究和试点工作。其后，国务院在1986年出台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又指出：“要加强教育事业的管理，逐步建立系统的教育评估和监督制度。”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引导、组织和扶持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建设得以迅速发展。

基于对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政策文本内容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见图3），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期在政策理念上，主张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明确坚持思想政治条件与业务条件二者并重的标准，坚持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提升的发展理念。政策主体上，“教育”作为政策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与“委员会”“组织”“行政部门”等节点之间存在关联，说明该时期教育评价政策主体发生了明显变化，其多元性开始显现。政策内容上，对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的职责、评价标准和方法等做出明确规定是该阶段政策内容的重点。政策工具上，除了基本的“规定”等命令性政策工具之外，考核激励工具和能力政策工具开始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教育评价制度在该阶段仍然表现出较强的权威性特征。政策目标上，从“教师”一词多次被提及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教育评价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加强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

总的来说，在快速兴起阶段，教师替代前一个阶段的教育和学校，成为党领导下教育评价制度的研究重点。结合前期政策制定的经验，我国教育评价制度不断调整和适应，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动力和制度空间，政策内容更为具体，但相关政策主要集中于对教师的评估和考核，且对教育评价制度的法律地位重视不够。

**4.繁荣发展阶段（1990—2009年）**

1990—2009年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繁荣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等为代表的教育评价相关政策，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走向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建立完整的教育评价制度体系成为这一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1990年，国家教委颁发《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我国开始逐步形成正规开展教育评价工作的局面。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推进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教育督导暂行规定》（1991年）、《普通中小学校督导评估工作指导暂行规定》（1991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等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建立，并已形成教育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要求建立各级各类教育评估机构 ，为我国教育评价活动的开展提供组织保障。199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更是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 ，教育评价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随后，各级各类教育评价政策的出台使得教育评价制度在不断完善的同时，渐趋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基于对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政策文本内容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见图4），我们可以发现，教育评价政策较之前阶段演化出新的特点。政策理念上，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科技、社会相结合，强调把教育摆在现代化建设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由于政策文件中对各级地方政府开展教育评价也做了部署，因而在政策主体上形成了自中央到地方均对教育评价高度重视的局面。政策内容上，基于素质教育要求进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成为该阶段教育评价政策的热点。政策工具上，“规定”等命令性政策工具的主导作用逐渐减弱，教育培训、技术支持等能力建设工具在该阶段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从学校和社会的网络关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政策目标是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发挥社会对学校教育的监督作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评价制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总的来说，在繁荣发展阶段，党领导的教育评价制度开始向正规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相继出台了高等学校教育评估、中小学校督导评估、普及义务教育评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等专门文件，为后续我国教育评估制度的全面发展和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经验和政策基础。但是，在我国教育评价制度蓬勃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各个主体间协同参与水平较低，评价内容、标准和模式单一化等问题，且伴随着社会问责意识的日益觉醒，教育评价制度受到诸多批评。

**5.深化提质阶段（2010年至今）**

2010年以来是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深化提质阶段，这一时期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为代表的教育评价相关政策，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了“整合国家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及资源，完善监测评估体系”、“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探索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等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具体要求。这是之后一个时期指导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国教育评价制度至此进入到深化提质阶段。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42条“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强调，“推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的运行机制”。可见，在这一时期，综合评价制度逐步确立，并进入到全面推进时期。同时在综合评价制度稳步推进以及立德树人教育体系逐步完善的背景下，教育评价制度的多元主体格局也基本形成。教育领域的发展需求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对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及《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政策文件从教育现代化角度为我国各层次教育的评价指引了方向，促使教育评价制度开始向全面、创新的发展格局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10月13日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组织实施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开启了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大幕 。

基于对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政策文本内容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见图5），我们可以发现，“发展”成为仅次于“教育”的关键节点，并逐渐向网络中心靠近，说明这一时期政策理念上，更加注重发展和强调改革创新，关注教育公平，明确了提高教育质量和育人为本的新思想、新理念。政策主体上，教育评价政策所辐射的范围愈发广泛，更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机构开始协同参与到教育评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政策内容上，多次提到要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师和学生的综合评价制度机制，推动教育领域综合评价改革。政策工具上，在原有的命令性政策工具的基础上，出现了教育制度建设、政策倾斜等能力建设工具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权威重组工具，政策工具的使用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政策目标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教育全面发展、建设教育强国是该阶段最为显著的目标定位。

总的来说，在深化提质阶段，党的工作重心较繁荣发展阶段发生重大转变，在领导教育评价制度向系统化、正规化方向迈进的同时更加关注制度的质量提升和创新发展，我国教育评价制度进入深化提质阶段，政策主体多元化、政策内容覆盖广、政策工具多样化，政策制定与出台迎来历史黄金时期。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进入了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制度崭新范式的新阶段。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变迁的基本特征及规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变迁，具有鲜明的特征及内在规律。

**（一）基本特征**

**1.政策理念：从“服务革命”向“改革创新”转变**

教育评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依赖于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理念，而政策的发展变革则体现出政府政策理念和政策价值观的演变。坚持以什么样的政策理念为指导，是教育评价制度的首要问题。在早期萌芽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教育建设，体现出浓厚的服务革命的价值取向，如毛泽东同志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文化教育的方针理念就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到初步探索阶段，政策理念上更加强调教育评价的政治性，如195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到：“评判学生学习成绩的时候，应该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地位。” 在快速兴起阶段，主要体现为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等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理念。在繁荣发展阶段，教育评价与科技、社会相结合的价值特征尤为明显。在深化提质阶段，随着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教育评价制度的持续发展，改革创新的政策理念逐渐形成，通过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健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教育评价制度体系，已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理念传承和创新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如长期以来形成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评价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各阶段所倡导的教育评价理念的导向功能，进而在实践中，各级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教育评价理念传承和创新作用的重视程度不够，创新动力不足，使得评价理念未落到实处，没有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

**2.政策主体：从“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

我国教育评价的政策主体经历了早期的单一领导到现阶段的多元参与。如在早期萌芽阶段，党中央和苏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评价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着绝对领导作用，是教育评价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初步探索阶段，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政策主体也基本上以“中央”为主，已颁布的政策中很少提及其他相关部门。在该阶段，中央无疑是推动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这种政策主体的一元性使得出台的政策具有高度权威性，但与此同时也会造成决策权力集中、决策信息封闭和政策执行困难。随着教育评价制度的快速发展，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等政策制定主体开始出现，教育评价政策主体的横向范围扩大。在繁荣发展阶段，教育评价制度的政策主体又逐渐向纵深发展，既强调发挥中央政府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又注重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积极参与，但彼此间协同参与程度较弱。发展到深化提质阶段，教育评价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也愈加复杂，政策主体虽然日渐多元化，联合发文数量相较前一个阶段有所增加，协同参与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总体来说并未形成良好的沟通协作关系。政策制定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是提高教育评价政策效力的有效方法，但如何增强政策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全面提高教育评价政策和制度设计的质量，是现阶段需要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

**3.政策内容从“单一松散”向“系统规范”转变**

教育评价政策内容的关注点由分散性、单一性向系统性、规范性的方向发展，体现出党和政府对完善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重视。在早期萌芽阶段，政策内容关注的焦点在于发展群众和青年儿童的文化教育，如1934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小学管理法大纲》中提到要通过平时成绩的积分、每月的批评、学期学年考试以及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的成绩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 。在初步探索阶段，主要重视对各类学校教育进行调整、巩固和改革，有关教育评价制度的内容依附于其他政策中，专门性的教育评价政策并未出台。在快速兴起阶段，教育评价政策的内容扩展到对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等方面的考核和评估中，旨在注重调整和整顿教师队伍。在该阶段开始出现有关教师评价的专门文件，如《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责及考核的暂行规定》（1979年）、《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1981年）、《嘉奖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暂行办法》（1989年）等。在繁荣发展阶段，政策内容涉及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师和学生的专门评估，教育评价制度在该阶段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逐步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深化提质阶段，教育评价政策内容更趋丰富，进一步呈现出专业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特征，这对我国教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但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教育评价的标准和内容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僵化，“五唯”现象日益严重，成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亟需突破的现实困境。

**4.政策工具：从“强制工具”向“混合工具”转变**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方式。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政策工具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麦克唐纳尔和埃尔莫尔认为政策工具包括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权威重组工具和劝告性工具等五大类。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选择一种或多种政策工具来保证政策执行的效力。在早期萌芽阶段，教育评价相关政策以苏区教育部、委员会发布为主，计划等命令性政策工具的使用明显不足。在初步探索阶段，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开始起步，政策工具较为单一，基本上是以批准、规定等命令性政策工具为主。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政策工具虽然有助于政府的统一管理和控制，但不利于其他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在快速兴起阶段，政策工具虽然仍然集中于命令性政策工具，但开始出现激励性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如1981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中提到对达到考核标准的教师，要给予表扬或奖励，并按规定发给酬金。198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关于中、小学教师队伍调整整顿和加强管理的意见》中指出，可以通过培训使业务能力等方面不完全合格的教师较快成为合格教师。在繁荣发展阶段，政策工具的使用开始逐步倾向于教育培训、技术支持等能力建设工具，并与其他类型的政策工具形成优势互补。在深化提质阶段，权威重组工具也被运用到教育评价政策中，各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在该阶段得到不同程度的使用。然而，从教育评价政策工具的使用效能来看，其效果滞后且未能有效解决教育功利化的顽瘴痼疾，进而扭转当前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5.政策目标：从“普及教育”向“全面发展”转变**

我国教育评价政策目标实现了从革命战争时期的普及教育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恢复教育秩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推动教育全面发展的转变，体现出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在早期萌芽阶段，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当前教育工作的任务是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可见，我们党在成立初期就把实现人民群众接受教育作为奋斗目标。在初步探索阶段，我国教育事业百废待兴，教育评价政策围绕“教育恢复”展开，目的是大力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如《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这一时期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教育秩序，改革招生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选拔和培养人才。在快速兴起阶段，我国教育评价政策目标转向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质量，进而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到繁荣发展阶段，政策目标进一步强调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通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深化提质阶段，党和政府对教育评价政策的终极目标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如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年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是经过5至10年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然而在教育实践中，由于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影响下的教育评价的功能错位 ，教育评价过程的有效性、教育评价结果的质量和可信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评价政策目标的实现。

**（二）变迁规律**

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经历了制度生成、制度延续和制度变迁三个紧密相连的逻辑环节，并呈现出特定的演进逻辑：在每个历史阶段，由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构成的外部环境是决定教育评价制度生成的驱动力，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对政策内容和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着力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政策内容和目标均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评价主体、制度属性、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以及三者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是影响制度稳定和延续的关键；在某个时间点，当评价主体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于制度属性，致使制度内部各要素之间冲突性增强且相互背离时，教育评价制度的变迁更容易发生。

总的来说，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就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稳定存在的机制和规律，是评价主体、外部环境和制度属性三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并逐渐由旧制度向新制度发展演变。实际上就是回答制度如何生成、延续和发展的问题。在制度生成、制度延续和制度变迁的每个环节背后，都有一些稳定存在的规律性的逻辑因素，它们是解释教育评价制度变迁逻辑的关键。通过详细阐述和解释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历程中的内在规律，不仅能够在理论上理清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更有助于在实践中把握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和变迁的改革方向。

**三、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展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在百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取得了辉煌成就，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我国当前和今后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任务和新挑战，教育评价制度势必要积极寻求制度优化与创新，以适应当前教育领域的发展需求。为此，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高度重视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的理念共识和创新**

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百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教育评价理念的传承与创新始终是我们党教育工作开展的先导和内在根基。新时代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的理念共识是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提出促进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战略愿景和行动方向。当前，要重视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的理念共识和创新，使之成为指导新时代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依据和指南。首先，政府、社会等要对新时代教育评价制度理念达成共识，以此影响并引领各级各类评价主体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使评价主体的价值理念与教育评价改革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其次，要加大对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的宣传解读力度，达成教育评价改革所需的社会共识，提升社会各界对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的关注度和认同感。最后，教育评价制度建设要改变原有的教育评价理念和思维方式，树立内涵式发展的评价理念，强化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用新的教育评价理念引领构建符合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求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推进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的深入开展。

**（二）加强多元协同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建设**

百年来，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才取得了辉煌成就，新时代应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并着力促成政府、学校、社会等主体积极参与、通力配合、协同推进，才能确保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真正落实到位。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促进教育评价制度发展的同时，也会导致责任主体权责不清等问题，从而影响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成效。为此，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在未来改革中应进一步加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评价体系建设，明确评价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发挥协同效应，形成改革合力。一方面，通过明确共同目标，细化各主体间的职能与责任，明确政府、学校和社会第三方评价组织之间的职能边界，尤其是对各主体在教育评价过程中的权责要以法律明确规定，从而建立起有效的协调制度。另一方面，政府、学校与社会三者之间要加强交流与互动，逐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教育评价新格局，加强教育协同评价的信息沟通，确保各评价主体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

**（三）系统优化教育评价标准和内容**

教育评价标准和内容是教育评价制度实施效果得以保障的关键要素。回顾百年发展历程可见，我国教育评价标准和内容在党的领导下与时俱进，积极走向细化与完善。新时代教育评价制度建设要在评价内容上进行系统考量，将破“五唯”转化为多维度、多方面的评价内容，综合考虑不同的机构类型、人员等被评价对象，以及不同的学科特点等因素，制定更加多元化和有针对性的教育评价标准，通过多层次和多样化的评价标准提高评价质量和水平，不断完善教育评价制度。具体来说，要将保障教育公平、学生全面发展等内容纳入教育政绩考核指标，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教育政绩观，推进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坚决破除“唯升学”的错误倾向。要将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实绩作为评价教师的主要依据，坚决克服“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等评价导向。要将以分数作为标准的评价转向以道德、个性、兴趣等为标准的多维度评价，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地发展。要坚持以品德和能力为评价标准和内容，改变社会用人“唯文凭”的导向。总之，加快完善教育评价标准和内容，将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正确评价导向等作为教育评价制度的重要内容，这是深化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四）加强新时代教育评价工具的研制和创新**

教育评价工具是教育评价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战略工具，也是科学实施教育评价的方式和手段。从百年历程的回顾分析中可以看出，教育评价制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教育评价工具的运用。新时代教育评价制度建设要加强教育评价工具的研制和创新，针对不同主体、不同学段，研究、开发和创新教育评价工具，确保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顺利推进。当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育评价工具，实现教育评价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提升教育评价的质量和效率，并以此确保教育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此外，教育评价工具的研制应重视多种手段和方式相融合，比如可以通过建立电子档案袋、教育数据跟踪等形式来强化过程评价，还可以通过设计双向细目表、关键事件记录方案等质性评价工具来改进结果评价；加强对增值评价模型和评价技术的研究，如垂直量表设计，用以分析和处理相关因素，科学描绘进步程度来探索增值评价；构建包括思想品德、身心发展在内的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问卷测评表、访谈、观察等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来健全综合评价。总之，创新教育评价工具，建设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教育评价制度，是大势所趋。

**（五）推进教育评价结果的有效运用**

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和变迁历程还可看出，教育评价政策目标要想顺利实现，就必须高度重视评价结果的运用。目前教育评价结果的指导性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影响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目标的有效达成。因此，新时代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要想顺利推进，不仅要在教育评价的观念上进行优化和提升，更需要用科学可行的评价结果督促后续的制度改进，使教育评价制度建设真正落到实处。未来应将教育评价结果的运用纳入整体规划中，细化结果运用的环节和要求。首先，根据教育评价结果及时进行问题诊断，引导专业机构对评价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不同主体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进行分类指导，积极采取改进措施。其次，细分政府、学校、社会等主体对教育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所承担的不同责任，明确各主体在特定时期内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督促其落实责任、积极解决问题。最后，完善教育评价结果整改的督察问责制度，将教育评价发现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党委巡察工作范畴，以党委强有力的政治监督来推动教育评价改革落地生根。

总体上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教育评价制度发展变迁的过程是解决不同阶段教育评价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进程的总体把握和准确判断。纵观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百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任何一个阶段的教育评价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需要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社会矛盾的转移、党的中心工作和教育发展的需求等多种因素，进行不断调整、优化和创新。因此，准确回顾和认识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百年发展历程，认真总结其阶段特征和总体变化特征，进而挖掘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不仅有助于我国教育评价制度的不断完善，更可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全面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